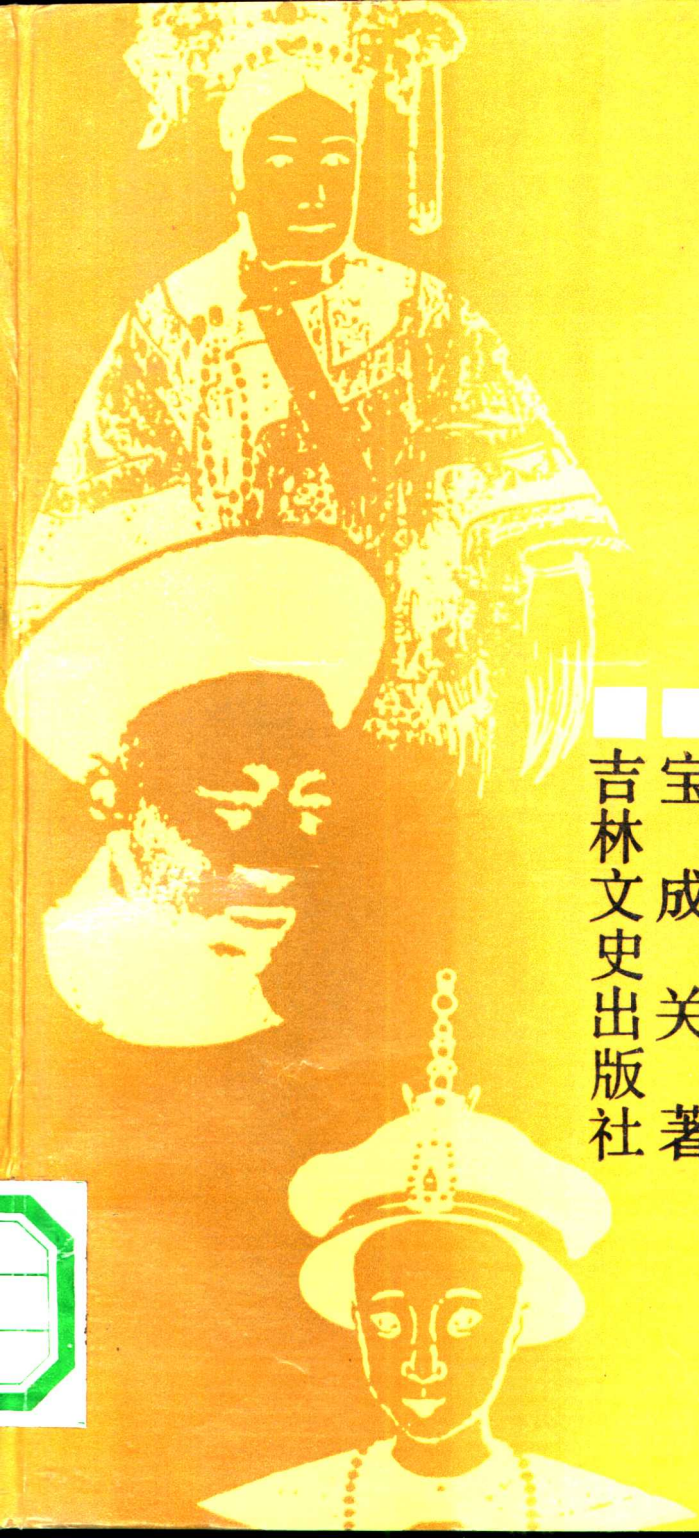


奕訢慈禧政争记

宝成关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奕訢慈禧政争记

宝成关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 ylxincixizhengzhengji

实诉惹搞政争记

宝成关 著

责任编辑：尚尔元

封面设计：姜凡

扉页题字：罗继祖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13印张8插页315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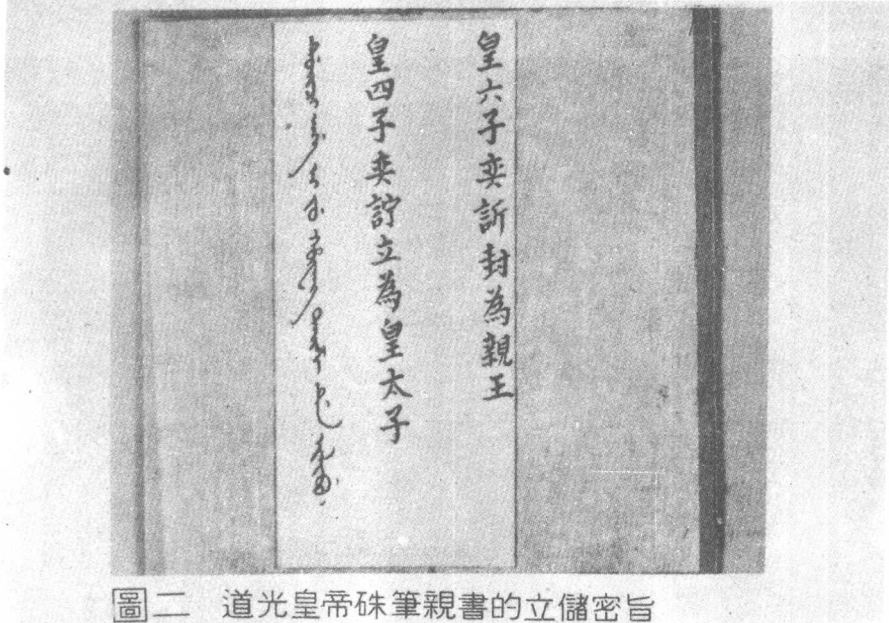
印数：1—5 620册 定价：5.60元

吉林新华书店发行

ISBN7—80528—239—0/K·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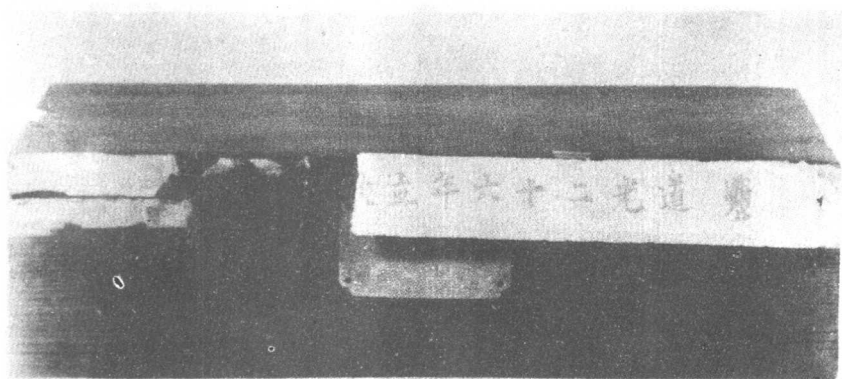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像



圖二 道光皇帝硃筆親書的立儲密旨

道光帝立儲密旨



圖三 道光收藏立儲密旨的鑄匣

Emperor Dao Guang's box for secret
testament on succession to Qing throne

道光帝收藏立儲密旨的鑄匣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主编前言

黄兴涛 杨念群

十多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它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能够有新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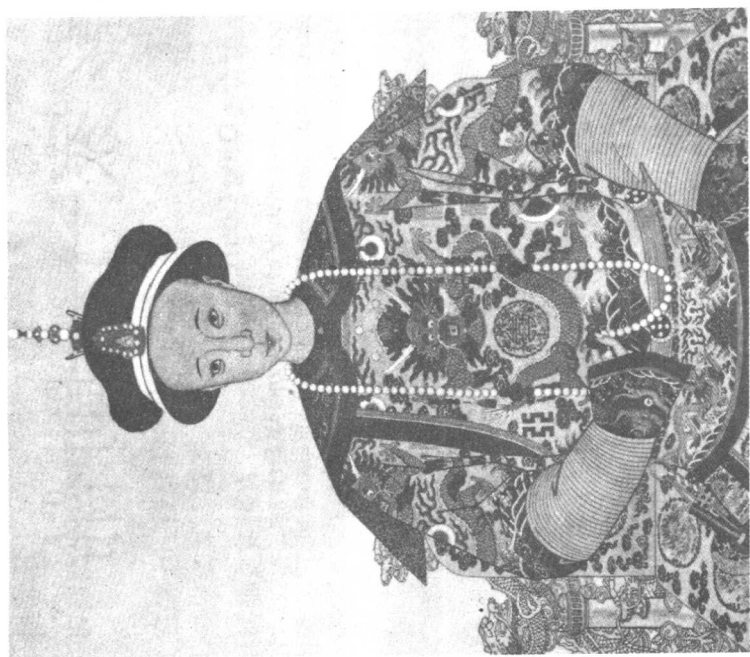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政府所雇佣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外国在华报刊及西方各大报派驻中国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律师和商人。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远非同时期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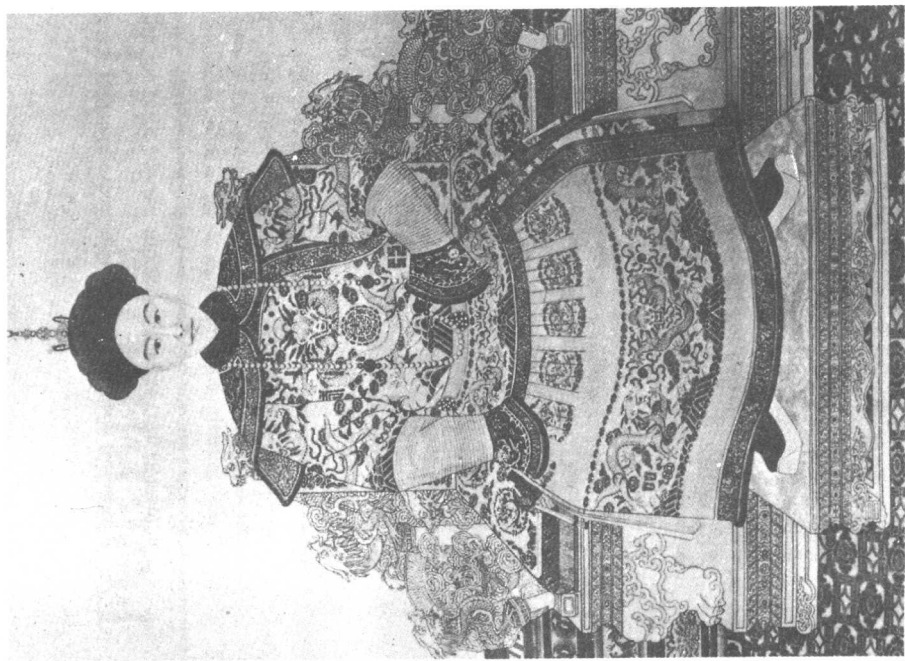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此对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就只有文化传播的意义了。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



上图：同治帝像

左图：光绪帝像





奕訢像

諭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兩宮
 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據奏嘉祺奏恭
 親王辦事徇情貪墨多招物議情
 等弊嗣此事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雖無
 實據是出有因究屬諂媚知事難以懸揣
 恭親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放
 以仗勢高權重目無君上有朕沖齡諸多
 挾致往諸始離間不可細問每日見
 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此情形
 以後何以能辦國事若不即早宣示朕歸
 政之時何以能用人豈正嗣此種重大
 情形迭次深究方知朕寬大之恩恭親王
 着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
 准干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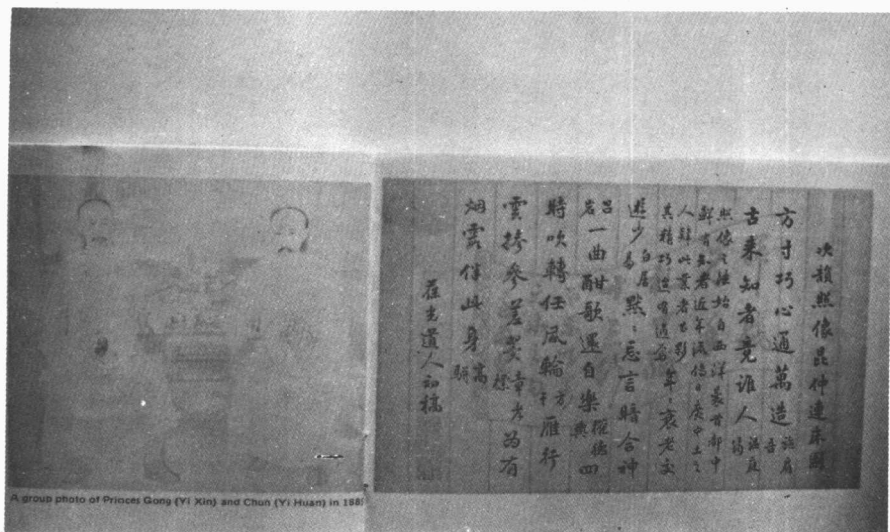
宮故諭硃筆親禧慈恩
 同治四年正月初五日
 硃筆親禧慈恩
 手書第二冊
 免恭親王別字
 為建字第一
 諭手之為
 (印刊決一一第字寫手禧慈恩為此)

慈禧手迹 (同治四年要免恭親王硃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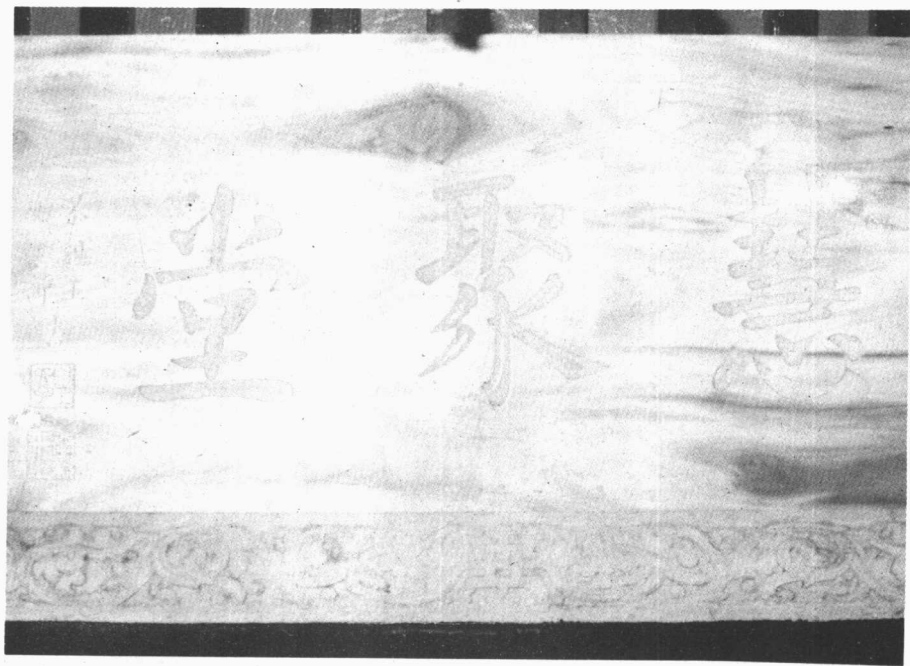


章 鴻 李 之 年 初 治 同

李 鴻 章



奕譞手迹（该手迹题昆仲连床图，图中为奕訢和奕譞）



序

李 侃

宝成关同志在他的新著《奕訢慈禧政争记》出版之前，特地
把排印清样寄给我，要我写一篇“序言”之类的文字。粗读之
后，我对这位中年学者刻苦扎实的治学精神感到钦佩；同时对他
选择的这个历史课题也深感兴趣，并使我受到不少教益。

慈禧和奕訢这两个人，对于清朝统治晚期来说，可以说是带
有关键性的人物。前者作为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把持政权长达近
半个世纪；后者作为重大决策的主要谋划者和参与者，对晚清政
局的变动和命运，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慈禧和奕訢之间
联合与分裂，互相依靠又互相矛盾，互相合作又互相争斗，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清朝晚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
盾。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夜的将近半个世纪
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充满了内忧和外患，危机和变
革，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的尖锐斗争。对于清朝统治来说，
以“自强新政”为标榜而兴办的“洋务”事业，结果事与愿违，
以幻灭告终。接连而至的是受到外国侵略者的三次严重打击，这
就是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战争，而且打击的程
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在外部打击的同时，
继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又接连受到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
自立军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早期革命活动的冲击。在那
样一个风云变幻、危机四伏的年代，新旧阶级力量、各种政治
势力的派别和集团，都要走上历史政治舞台，演出历史的悲剧和

喜剧，壮剧和丑剧。各种各样的头面人物，都要扮演代表自己阶级利益和阶级意志的角色，喊出自己的口号，亮出自己的旗帜。都要力图证明自己的存在和统治地位的合理性，都希望把历史的进程纳入自己所设计的轨道。新生的、革命的阶级是这样，没落的、反动的阶级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和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看来，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必须重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在阐明阶级斗争和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时候，在强调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剖析历史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说过，只能研究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不能或不必要去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只能研究革命的历史，而不能或不必要研究反革命的历史。我们只要去认真读一下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他有关历史的著作和论述，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怎样以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锐利的理论武器去剖析各种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揭示这些事件和政治斗争的阶级本质。然而，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曾经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了片面的和简单的理解，仿佛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只要研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够了；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只要研究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就够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固然应该而且必须着重研究，但这些并不等于历史的全部内容。且不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多种因素、多种条件构成的复杂而多样的历史，就以构成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内容来说，也是两个或多个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任何阶级社会都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没有统治阶级，又哪有被统治阶级；没有反革命阶级，又何来革命阶级。何况除了革命和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的阶级分野之外，社会上也会存在着各种并不直接属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其他阶层。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片面化、绝对化，必然要导致对复杂历史的简单化、直线化和图式化，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对历史的考察、分析、评判正确不正确，并不取决于研究什么，而要看研究者选择的对象与课题，是不是具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而更重要的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近十年来，在克服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偏向，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历史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以往很少或无人问津的对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开展，并且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宝成关同志的这本《奕訢慈禧政争记》就是其中之一。

奕訢和慈禧，既是清末统治阶级中两个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人物，又是都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近几年来经过电影、戏剧以及掌故传闻的媒介渲染，使人们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辛酉政变”直到“八国联军”闯进北京城，这个屈辱年代的历史以及“垂帘听政”的“老佛爷”和位极人臣、三起三落的“鬼子六”，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往往由于把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编织涂饰，把官闱隐秘和权力斗争掺合杂揉，给这幕历史罩上层

层迷雾。慈禧和奕訢之间合而又分，分而复合，互相利用又互相倾轧，并由此表现出的晚清政局纷争与混乱，表面的暂时平静和深刻的统治危机，并不能完全用慈禧和奕訢之间的个人恩怨、性格品德去解释。实际上这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激烈民族矛盾和压迫反压迫的国内阶级矛盾，在封建统治内部的反映和折射。充满权术机谋和戏剧性的“辛酉政变”；对曾、左、李等汉族疆吏的重用，“借师助剿”和“中外和好”以及“洋务”事业的举办等等这些重大的政治决策，都反映了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如何调整 and 加强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力量和权力分配；如何缓解封建统治的危机和“自强求富”，都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和分裂。而这些主要由奕訢制定并由慈禧首肯的重大决策，确实也暂时在表面上缓和了外部危机，增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以及同、光之际统治集团的政治势力，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的失败。而洋务事业的兴办，又开始在中国出现了一点近代工业生产方式，孕育和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围绕举办洋务事业的洋务派与顽固守旧派之争；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主战与主和之争；戊戌变法时期表现为支持同情变法和反对变法的帝党与后党之争；义和团运动初期，利用扶持义和团与镇压义和团之争等等，同样都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在封建统治内部引起分化的反映。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并不是简单地、直线地与统治阶级互不相关的单方面的自我推动，而是通过在阶级对立和斗争过程中阶级力量的消长，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以及体现一定阶级利益和阶级意志的各种各样人物的思想、实践表现出来的。

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群众，这是阶级社会历史上一切统治阶

级的共同本性。但是在由谁统治和怎样统治上，又会有不同的政见和不同的方法，因此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形成不同的政治派系。不论中国和外国，古代和近代，只要是由剥削阶级进行统治，情形都是如此。所谓集团和派系，其实是阶级的一翼，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集中体现了特定阶级的利益、要求和特征。因此当我们对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统治阶级进行考察的时候，除了对这个阶级作整体的一般的分析和估量而外，还要特别注意对统治阶级中的各个集团和派系进行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而集团和派系的利益和主张又是由结成这个集团和派系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政策、活动表现出来的。因此，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的统治阶级的典型人物，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往往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透视整个统治阶级的全体。本书所剖析的奕訢集团的形成及其与慈禧的联合、分裂、矛盾、争斗过程，具体而生动描画出晚清统治阶级的面貌和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斗争场景。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经常表现为争夺统治权力而勾心斗角，甚至厮杀火并。历史上由于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所谓“宫廷政变”，层出迭见，史不绝书。然而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根本没有是非曲直可言，根本没有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时势与倒行逆施之分，从而不屑一顾。因为即或是由剥削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统治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措施，也会对整个社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历史上某个封建王朝在某一个时期，采取了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社会相对稳定的政策，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就会相对缓和，从而出现比较兴盛的局面。反之，如果实行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无止境地横征暴敛的政策，就势必加剧社会动

乱，激化阶级矛盾，从而造成人民的灾难，并导致统治者自身的灭亡。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就以晚清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与顽固派、帝党与后党而论，它们固然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当然也都要力求维护和巩固清朝的统治。但是洋务派毕竟为了“求强求富”而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注意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一些近代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些“洋务”人才。这和颟顸愚蠢、对近代事物深闭固拒的顽固派比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活动。对甲午以至戊戌的帝党和后党，也应作如是观。不过由于时势变迁，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清朝统治者早已腐朽没落，无论他们怎样力图挽救统治危机，也不可能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阻止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洪流的冲击了。

宝成关同志是一位刻苦自励、脚踏实地的中年学者，我曾读过他的一些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这本《奕訢慈禧政争记》是他多年潜心钻研的新成果。此书虽然以奕訢、慈禧两个人物在晚清政坛上的合分争斗为主线，但依据大量史实，层层铺叙，层层展开，而且把时间跨度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政治风云变幻如此剧烈，各种社会矛盾如此复杂的晚清政局，通过奕訢和慈禧之间的“政争”论述分析得又如此条理清晰，实属难能可贵。同时作者不论在资料的搜集、鉴别和剪裁使用上，在根据史实的分析立论上，都采取了严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史事人物的评判，时有新意，而又不故作“新奇”；对各种记载传闻能广收博览，但又不轻率信用。在表现形式和写作文风上，力求朴实而不枯燥，生动而不浮华。凡此种种，都可见作者用力之勤，构思之精。我个人感到这是近年来有关晚清政局和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可喜的收获。

以上这些，是我粗读宝成关同志的这部新著之后的一些初步